

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

全 球 冲 突

——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

〔澳〕约翰·W·伯顿 著

马学印 谭朝洁 译

乐 光 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D 815
12

80747

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

全球冲突

——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

〔澳〕约翰·W·伯顿 著

马学印 谭朝洁 译

乐 光 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1年·北京

DG 85 / 13

GLOBAL CONFLICT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y John W. Burton

根据英国Wheatsheaf Books 公司1984年

英文版译出

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

〔澳〕 约翰·W·伯顿 著

马学印 谭朝洁 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安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5.25印张 122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11-318-6/D·260 定价：3.00元

印数0001—3000册

译者序

约翰·伯顿是国际冲突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著述甚丰，因在该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而饮誉国际政治学界。

《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一书是伯顿的力作。他在此书中以敏锐的观察力，将隐藏在国际危机之后的国内不稳定因素展示在我们眼前。伯顿把科学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为研究和解决国际冲突构筑了全新的理论框架。

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国际冲突此起彼伏，苏美对抗时紧时松，这些现象的出现，究竟根源何在？是两大制度的矛盾，还是民族国家间的彼此猜疑？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还是超国家组织的内在缺陷？是某些领导人的专横独断，还是现存各种制度本身的不足？这些都是伯顿著作力图回答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观点，强权政治是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现实，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使国际冲突不可避免，伯顿则把着眼点放在国内，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内部的共有缺陷及权力政治的传统观念对决策者的影响，提出了“国内制度缺陷必然外溢到国际领域，从而导致冲突和危机”的基本判断。寻根溯源，是为了找到解决冲突的途径。伯顿在本书的第三、第四、第五部分中，集中探讨了观念的范式转换、区域——功能化模式、变革与发展以及弱小国家、国际组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者在冲突解决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这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现实途径大有裨

益。这也是我们将此译作奉献给广大读者的初衷。

由于译者涉足国际冲突理论研究的时间不长，译文中对某些专业术语的处理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指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副主任、本套《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副主编宋新宁同志在本书审定过程中提出过不少宝贵意见，并对译文作了必要的修改，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译 者

1989年1月于北京

序 言

约翰·伯顿通过写作《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据此来判断包括国际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优劣。经过多年杰出的外交活动和学术研究，伯顿得以用简洁的笔触将自己学到的、提出的、实践过的、写作过的和讲授过的诸多观点和看法传授给我们。本书提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凯恩斯的《经济学通论》。我认为全球在社会和政治上如此扭曲反常和危机四伏，以致我们必须诉诸本书即伯顿的“绪论”所提出的具有创见性的措施。

伯顿指出了权力政治模式已经过时，并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侧重于当代社会中的交易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关系的作用。伯顿令人信服地指出，权力关系理论无法解释苏联为何担心波兰发生的事件，更无法解释美国为何担心中美洲社会政治局势的发展。他指出，运用权力来寻求国家利益的诸国，会发现自己受到具有重要意义的交互作用的限制。因此，他的结论是，权力在寻求有价值的关系方面只能起辅助性作用。

伯顿在此书的绪论中指出，权力理论家们完全是错误的，世界正渴望着满足个人和集团的共同需要。安全不是一种有限的战

略手段，相反，它是一种无限的、取之不尽的战略手段——一方越安全，另外一方也就越安全。个人、民族集团和文化集团都在寻求得到其近邻和更广泛的外部世界的接受和承认，其目的主要是满足自己的内在需要。全球性国际问题是国内问题外溢的结果，反之亦然。

伯顿在他著名的绪论中给交互作用和交易以十分显要的地位。他认为，世界上的文化承认和民族承认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和国内和平，必然会由于重要的交易在质和量上的提高而日益增加。因此，政治和政策必须为国际系统内的成员、为交互作用（这种作用可满足人们所珍惜的价值）设计出当前的和未来的角色。

根据伯顿的推论，冲突的解决是一项复杂但却有益的事业。它是一个可以使冲突各方都认为自己处于胜局地位（win-win situation）的过程。缔造和平的活动也从只在形式上和法律上注重单一的、引人注目的停火，转向注重探求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那些有价值的关系。此外，还包括制定抑制暴力的法令、了解新的规范、确立积极的交互作用并设计出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体制来减少世界的结构性和行为性暴力。

无论同意本书的观点与否，读者都不能不佩服伯顿在论述当代世界以及超级大国在其中的作用和责任时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

马里兰大学国际发展中心
爱德华·E·阿扎尔

前 言

本书论及的题目非常广泛，这在探讨复杂的全球冲突问题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本书的重点最终还是研究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是怎样外溢到世界体系中去的。这种国内政治问题外溢到世界体系的情况明显地表现在诸如黎巴嫩冲突、萨尔瓦多冲突这类冲突中。而涉及到苏美关系和国际社会正在形成的许多冲突局势时，人们对这种情况就看得不那么清楚了。我们往往以大国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来解释这些关系；可是，每当出现国际紧张局势或冲突时，我们的注意力最终总是被吸引到国家内部制度的缺陷和维护现存体制的问题上。这一点既适用于小国的对外关系，也同样适用于苏美的对外关系。

正如本书绪论所阐明的那样，笔者的分析是在一种摆脱传统的和认识一致的框架内进行的。这种分析方法不会立刻为许多实践家和学者所接受，因为这些人是在一种强调把保存政治、社会结构和制度作为政府目标的文化环境中从事其工作的。本书的理论基础在于肯定某些与发展 and 生存有关的人类需要的存在，这些需要是人类本身固有的和普遍的。最终决定人类社会结构和体制的正是这些需要。这些结构和体制的缺陷足以说明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原因。如果不把这一事实考虑进去，那么各种干预政策和解决

冲突的努力都会失败。

把个人作为论证单位是对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重大挑战。宿命论论调，即便是起源于人类需要的宿命论论调，并非总是为人们（特别是所谓的“左翼”和“自由派”思想家们）所接受。最初还有一种唯心主义的论调。宿命论也好，唯理论也好，当代的思想和经验主义实践正在把我们带到这一领域。自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以来，那种认为政治是主观现象（subjective phenomenon）的观点一直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在较近的著述中，西方政治思想关心的是当权者对各种价值的分配。当时的统治机构、权贵和统治者有权确定各种价值，而其他人只有接受其裁决的义务。那时没有批判的科学基础，甚至也没有对不同模式的制度和政策作比较判断的科学基础。如果人类具有某些本体需要（而且我们会看到交叉学科的著述现在已含蓄地同意了这一看法），那么政策和各种政治制度便有了一种衡量的手段和依据。如果存在这种需要，那么，认为我们能够维持对立制度、权贵制度等各种西方制度，维护这些制度的威慑战略，就只能是一种空想。若要理解和解决由这些制度和战略造成的冲突，就必须在这一形成中的人类需要框架内对这些制度和战略作新的估价并确立新的概念。

在对政治生活本质的认识发生变化的同时，对认识本身的认识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本书的经验材料不多，因为实证的例子并无多大价值。人们可以运用相同例子的不同方面来进行反证。本书关心的是对许多根本的观点提出挑战，并从这些观点中提出新的概念和推论。

由于这两个原因，当代的学术著述并无多大用处，只会时常阻碍理论的发展。过去的著作已经涉及这个问题。本书研究的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经验的和哲学的范式变化。它的正确性在于它的预测能力、它与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验的吻合和它的内在逻辑。

有一个方面将引起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实践家和学者的关注。这一研究涉及全球冲突。苏美关系显然对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有苏联人的著述，尽管有访问苏联以及同苏联许多专业协会的来访者交换看法的机会，但西方学者对苏联问题的了解仍然很不够。因此，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讨论国家内部制度的缺陷时往往侧重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因为人们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了解的更加透彻。但是，这并不是说那些“公允”的论述都具有偏见，美国的结构和政策确有许多应当批评的地方。

实际上，这或许是本书分析部分的要旨。美国近来对国外冲突局势的干涉，就寻求的目标而言，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功。这些干涉看来是代价高昂且得不偿失。造成这一后果有三个原因。首先，美国试图寻求自身的安全利益，把这些利益置于当事国的价值和目标之上，而且在与这类价值和目标发生冲突时未能正确估量权力的局限。国家利益因此而受到损害。第二，对于美国卷入的冲突的实质一直存在误解，因此美国所寻求的解决冲突的方式也受到误解。第三，美国由于对自己干预的局势估计错误，因而只依靠武力和谈判来解决冲突，而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别的手段既是恰当的，也是可能的。这三个失败的根源都与美国结构和体制内的制度缺陷有关。它们不单纯是由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而是反映了某种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维护某些基本的利益观念的思想。

本书主要研究因权力政治功能失调而造成的结果，研究对各种局势所作的错误估计及其原因，以及与争端各方的利益和需要相一致的冲突解决手段。现在支持世界各地的暴君及其非法政权的正是美国。这就把保护和支持反抗国内不得人心的封建主义和权贵的力量这一有利地位让给了苏联。苏美虽然支持不同的派别，但它们的目的是手段却不谋而合。双方都沿袭了体制为主、人民为次的西方政治哲学。双方都无法容忍第三种选择，因而无

法发挥双方的优点和更有效地满足人类需要。这在权力政治系统内不可能进行自我批判。因此，苏美双方在将它们拉向第三立场的技术和人类需要这些共同的压力下都处于守势（当然前提是没有爆发战争）。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这两个大国谁先明白并承认个人最终是分析的单位，谁就将因顺应现实而“赢得”竞争的胜利。再有一种选择就是双方迈向同一方向并停止相互竞争。那么，这就等于对美国的结构和政策提出了批评，对苏联至少（即使不是更多）也提出了同等的批评。这种批评并不是针对美国人、苏联学者以及行政官员。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人民和他们的需要，而在于我们的思想体系和历史造成的那些环境。某些地方的发展将文明带到它们今天所处的地位——敌对、防御和权贵，从而阻碍着从遗传学上讲将会在一定时期发生关系变化的演进过程。归根结底，我们是否具备一种思维能力来改变我们设计的、或有意建立的结构和体制，使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更加顺应那些最终将摧毁它们的力量。假如能阐明这些问题，那么所有当事者都会愿意放弃其维护自己的社会结构和体制的短期行为。这正是本书所要论述的问题。

DG85/13

目 录

译者序

序言

前言

第一部分 绪 论 (1)

第一章 研究方法 (1)

第二章 公共政策的哲学 (13)

第二部分 制度的缺陷 (21)

第三章 个人与政治 (22)

第四章 权贵与“共同利益” (28)

第五章 越轨与异端 (35)

第六章 衰退还是不发达 (39)

第七章 中央政府和人民 (57)

第三部分 国际影响 (71)

第八章 联合国的缺陷 (71)

第九章 区域——功能化模式 (75)

第十章 弱小国家的作用 (82)

第十一章 苏美关系：法律规范 (87)

第十二章 隐含的事实：动机与意图 (93)

第四部分 解决问题的方法	(102)
第十三章 变革的问题	(103)
第十四章 交互作用的决策	(108)
第十五章 互得理论	(113)
第十六章 问题解决程序	(118)
第十七章 第二线外交	(126)
第十八章 学者的作用	(133)
第五部分 结 论	(138)
第十九章 问题的领域	(140)
第二十章 程序问题	(148)
跋	(154)

第一部分 绪 论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并附有结论。第一部分包括总论和本书所采用的一般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研究外溢到国际社会的国内制度的内在缺陷。第三部分考察这种外溢产生的国际影响和国际组织未能实现其宗旨的原因。第四部分探讨解决办法。结论部分则力图将各个部分贯通在一起。

我们研究的是各种复杂的交互作用和事件。如果不建立某种基本框架或哲学理论，就无法把这些不同的变量联结在一起。第一章主要探讨研究的方法并试图从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史角度阐述之；第二章旨在为这一研究方法提供一种理论—哲学框架。这种框架来自各种开始提出明确的公共政策哲学和客观准则的思想流派。

第一章 研究方法

本书旨在推断出处理美苏及全球长远政治关系的各种恰当的政策和途径，力求避开报界和政治家借以作出反应的日常事件，进行较为深刻、明确的分析。由于政策有赖于对特定的形势所作出的解释，因而有必要首先判定国际关系的实质，即探明这些关系

何以使双方那样紧张和危险的原因。

本书正是从这后一个方面开辟新领域的。本书不局限于论述对一方给另一方造成的威胁所采取的战略和威慑手段，不是论述各方所遭受的热核威胁，也不是论述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对抗。相反，本书指出潜在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于每一制度的内在缺陷，这些缺陷使各方甚至在没有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也缺乏安全感。这些国内的忧虑外溢到两国关系中，是有多种原因的。

由于这是研究国际关系，特别是研究美苏关系的新途径，因而有必要简要地说明一下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所经历的几个阶段。在国联瘫痪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国际上的法学家和一般学者都感到幻想破灭。他们强烈反对以法律—秩序方法（Law-And-Order Approach）来控制国际体系。他们倾向于用权力政治来解释国际关系。他们不再指望以国家共同体的形式来建立国际关系，而倾心于一种以各国的相对权力来决定国际关系的无政府体制。^①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人的想法与“台球模型”^②是一致的：各个分立的国家对它国作出反应，大国主宰小国的所作所为。联系仅限于外表，国际关系可作为与国内政治颇不相干的课题来加以研究。实际上，这一方式还反映在1945年起草的联合国宪章之中，该宪章的一项条款规定，任何成员国内部发生的事情当由国内进行的司法裁决决定，它不是联合国

① 在美国，该领域的代表人物是汉斯·摩根索，即最流行的国际关系学教科书《国家间政治：争取和平与权力的斗争》（*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eace and Power*）的作者。在英国，权力政治学派的代表也是一位国际法学家和德国流亡者——格奥尔格·施瓦岑贝格，著有《权力政治：国际社会的研究》（*Power Politics: A Study of World Society*）。这两本书的书名表明了作者纯粹犬儒主义的主旨。

② 见阿诺德·沃尔弗斯所著《纷争与合作》（*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该模型被用来描述权力政治方法。

所关心的问题。^①

到了60年代，问题已很清楚，这一看法已显得过于简单化了。这时，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流派，它在不否认相对权力重要性的情况下，赋予跨国界的交往和交易的重要意义。其中许多交往和交易是不受国家控制的。战时技术的发展使这类交易大大增加。“台球模型”便让位给“蜘蛛网状模型”^②。这种情况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系统和交易网络，这些系统和交易超越了国界，并且可将国际的国家体系转变成一种世界社会。强调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论，或者对现实的各种看法出现了，并且逐步占据了比权力理论更重要的地位。

这些思想理论上的重大进展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各国不仅关心用于防御或扩张的权力的获得，而且也关心经过价值判断的各种交易。这意味着权力的施行受到诸多限制，这些限制是各国赋予这些交易的价值所固有的。当时产生的一种理论指出：各国总是竭尽自己权力范围内之全力来追求其国家利益，但由于需要促进和维持作为国家利益组成部分的贸易在技术上的重要相互作用以及在防务和其他领域内的伙伴关系，因而各个国家行使其权力也是受限制的。言外之意，从本质上讲权力不再被看作一种目的，甚至不再被看作达成扩张或侵略之首要目标的手段。在寻求国家利益的作用上，权力退居次要地位，而经过价值判断的国际关系则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

这一研究方法与“控制论”很相似。“控制论”是社会学家在70年代为从总体上解释行为框架内的异常行为而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存在某些有待寻求的人类需要，这是些与发展相关联的本体

① 第二条中关于国内司法裁决的第七款是由当时担心其“白人澳大利亚政策”（现已废弃）受到干涉的澳大利亚代表提出，并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上作为一项修正案而获得通过的。

② 约翰·伯顿曾在他所著的《国际社会》（World Society）一书中用蜘蛛网状模型来强调了当代国际社会的交易性质。

需要；个人和集团总是利用他们掌握的所有合法或非法手段来寻求这些需要，而仅仅受他们对同社会其他个人和集团的关系所赋予的价值所制约。^①越南战争和伊朗事件的震撼、美国在控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上以及在控制中美洲和其他地区富于压迫性的权贵的行为上所表现的无能，都使得这种观点更具说服力。权力是有限的，当有其自身的利益要追求时，当大国又很重视与这些小国的关系时，大国就成了软弱无力的巨人。

然而，到了80年代，问题已变得很清楚：无论把权力和交易看得何等重要，无论这两种现象对国与国之间的行为的某些方面具有多大的阐释力，这种理论还是不充分的。权力关系理论无法解释美国为何那样担心中美洲极权和封建政权的反对派所寻求的改革。苏联并没有施加任何直接、甚或间接的重大影响，这就排除了美国支持现存高压政权的战略动因。因此，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波兰也是一样，在那里也一定有非战略性的原因才使苏联担心那里事态发展的后果。

国际社会里普遍发生的事件和小国的行为要求人们作出解释，而从权力和施行权力所受到的局限这一角度又无法作出恰当的解释。国际社会是以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发生的民族冲突、种族暴乱、大国和小国内部高烈度的街头暴力事件、高失业率以及不断加剧的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为特征的。除此之外，不结盟国家的政府都在寻求外援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许多国家依仗自己的武力来防止政治变革。它们从大国那里寻求的军事装备既用于国防也用来控制国内局势。国际社会里虽然还存在其它起作用的种种力量，而对这些力量不可能根据国家权力和同其他国家的交易所产生的制约来加以解释。一定有某种东西被忽略了。

这种被忽略的东西就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最初的

① 关于控制论的解释见保罗·赛茨所著《控制：社会秩序的基础》（Control, the Basis of Social Order）。